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限度*

吕耀东

[内容提要] 安倍政府调整对华强硬政策转而缓和中日关系,是在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知华派”、经济界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等内外因素共同影响下实现的。从借助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推进双边互动开始,发展到探讨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日经贸合作的可行性,尤其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使得安倍政府采取缓和中日关系的外交政策,宣称中日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仍是策略性的,日方能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仍有不确定性。

[关键词] 中日关系 对华政策 “一带一路” 协调主义

[作者简介] 吕耀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日本政治外交与中日关系。

日本对华政策调整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向来甚大。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的历史节点,执政党自民党要人、联合执政党党首、财界团体和政府高官频频访华,释放改善中日关系的意愿。安倍政府一改过往对华强硬做法,转而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经济界访华等形式,呼吁开展中日高层来往、启动对华全方位对话交流,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意向,并共同应对全球性贸易保护主义影响。本文拟就安倍政府对华关系的调整及其限度进行分析。

一、从竞争到“协调”：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

安倍二次执政以来,一直对华采取强硬路线,在国内及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将中国的海洋维权说成是东亚和平与稳定的破坏者,为其解禁集体自卫权乃至修宪制造舆论氛围。但是,安倍对华政策不仅使得日本周边外交乏善可陈,也客观上影响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及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安倍外交日益受到来自国内朝野的质疑,尤其是受到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和经济界的强力诟病,他们

开始呼吁安倍政府走出对华“外交困境”。在此背景下,安倍政府对华政策逐渐转向“协调”,加强双多边接触,释放缓和两国关系的意愿,展现出对华“积极的”的外交姿态。2017年初,安倍晋三首相在第193届国会发表施政方针演说中表示,“我们欢迎中国的和平发展。我们都充分认识到日中两国肩负确保本地区的和平与繁荣的重任。”^①展现出对华政策调整的积极姿态。由于日本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使得中日政府高层往来中断,安倍政府率先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渠道、经济界交流等行动来缓和中日关系,在多边场合推进双边接触,进而恢复双边对话机制。

第一,依托“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推进对华接触。中国共产党与自民党、公明党和社民党等主要政党长期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党际交流合作,已成为中日关系的一大特色和重要组成部分。日本民主党

*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日本外交战略及中日关系研究”(编号:GJ08-2017-SCX-2974)的部分成果。

① 『第百九十三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首相官邸の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7_abe/statement2/20170120siseihousin.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15日)

政府 2012 年对钓鱼岛非法“国有化”行为,导致中日关系全面恶化,双方高层互动终止,“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就开始成为双边交流的主要渠道。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以“加强政策沟通、扩大互利合作”为主题,下设“强化政策沟通”“扩大务实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三个专题会议机制。^① 2015 年 5 月,在中日关系尚处于困难的时期,时任自民党总务会长的二阶俊博组织 3000 名日本旅游业界人士访华,并向习近平主席转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习近平出席了二阶俊博及日本旅游界人士参加的日中友好交流活动。这被日方视为改善两国关系的积极信号。2016 年 8 月,二阶俊博出任自民党干事长,致力于改善与推进自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党际交流关系,促进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2018 年初,二阶俊博干事长与到访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竺举行会谈,再次表达了在《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际实现两国首脑相互往来的愿望。他表示“必须使今年成为令人难忘的一年,我们应该切实努力。”^②表现出对于缓和中日关系的急迫心情。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定期对话,执政党联盟内部“知华派”表达了恢复和发展中日关系的积极意愿。

第二,通过日本经济界探讨“一带一路”框架内的中日合作。中日互为贸易伙伴大国和出口对象来源国。中日两国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无法忽视。2017 年中日的贸易总额同比增长 9.8%,达 2968 亿美元。中国是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日本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对象(仅次于美国)。^③ 日本经贸对华依赖度高,经济界呼吁深化双边经贸关系,希望两国构建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2016 年 9 月,由日中经济协会、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高层组成的访华团在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谈时,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称“对日中经济的发展而言,确立两国良好的政治外交关系不可或缺。”^④2017 年 11 月,日本经济界再次组团访华,对李克强总理表达了希望参与“一带一路”框架内中日合作意向,并呼吁尽快签署日中韩自由贸易协定和东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表示,“作为经济关系发展的

基础,希望强化两国稳定的政治与外交关系”,^⑤可通过继续举行首脑会谈等维持良好关系。2018 年 5 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在日本经济界举办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讲,强调要深化中日关系。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致辞时强调,“希望以‘一带一路’经济带构想为首,积极推进在第三国市场的合作”,希望两国企业在亚洲各国的港口、公路、铁路等建设方面展开合作。日本商工会议所主席三村明夫也对中日双方就设立旨在完善亚洲基建的官民磋商机制达成一致表示欢迎。^⑥可见,日本经济界成为日本对华接触的重要方面。

第三,力求在多边场合实现中日双边高层互动。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在华举行前夕,中日达成“四点原则共识”,表达了双边关系的缓和不仅对两国有利,同时会促进亚太地区稳定与发展。2017 年 7 月,在德国汉堡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会谈,结合 2017 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的历史节点,表达了构建彼此“信赖关系”、推动两国关系改善的意愿,并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予以响应,传递了“附带条件”展开合作的想法。习主席强调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和“四点原则共识”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以此累积互信。^⑦ 2017 年 11 月,在越南岘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安倍首相与习近平主席再次会谈,表达了希望以

① 傅巍然、李博、雷光程“政治引领把握关系大局,交流合作共谋双赢前景”,《当代世界》2016 年 1 期,第 29 页。

② “自民党干事长会晤中国人大副委员长,望推动首脑互访”,共同社,2018 年 1 月 22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1/041dd791689b-->.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11 日)

③ “中日摸索从‘竞争’转向‘协调’”,日经中文网,2018 年 10 月 11 日, <http://218.213.94.166/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32523-2018-10-11-05-00-00.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0 月 11 日)

④ “日本经济访华团与张高丽会谈”,共同社,2016 年 9 月 21 日,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9/127501.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4 日)

⑤ “李克强面对日本访华团展现经济合作意愿”,共同社,2017 年 11 月 21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7/11/74e8d4788eb6.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 月 11 日)

⑥ “日本经济界期待扩大亚洲商机”,共同社,2018 年 5 月 10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9bd4800c584a.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6 日)

⑦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476410.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1 月 5 日)

2018年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为契机,与中方加强高层交往,开展互惠共赢的经贸合作,积极探讨在互联互通和“一带一路”框架内合作。^① 值得关注的是,在此次双边峰会中,安倍刻意避免提及刺激中国的南海问题、“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等话题。^② 安倍政府利用国际会议平台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促成中日首脑互动,并为启动和扩大两国间人员交流创造了良好政治氛围。

第四,重启对华磋商与对话机制。2017~2018年,安倍政府开始部分落实2014年中日达成的“四点原则共识”,逐步重启日中双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对话与磋商。一是日外相访华表达务实合作意向。日本外相河野太郎2018年初访华,称“希望世界第二与第三经济大国能够肩并肩,共同就全球变暖等课题展开讨论”。^③ 鉴于201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日方力求通过激活政府间及民间交流加快推进双边关系改善势头。这是河野就任外相以来首次访华,也是作为中日韩首脑会议主席国协调会议相关事宜,并向中方表达切实推进两国首脑互访的意愿。二是重启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机制就东海问题保持积极有效沟通,管控潜在危机,是两国涉海事务的综合性沟通协调机制。2017年和2018年,在中日第七轮、第八轮和第九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会议上,中日外交、国防、交通运输、农业、水产、环保和海上执法等部门的与会者共同探讨了开展中日海上合作的具体领域和方式,重点探讨了旨在避免钓鱼岛周边偶发性冲突的防务部门间的“海空联络机制”问题。^④ 通过多轮磋商,建立海空联络机制取得了一定进展。三是重启中断近8年的中日经济高层对话。随着中日在地区及全球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日本认识到两国“有必要更新视角,思考合作与携手的应有方式”。^⑤ 日本经济产业相世耕弘成表示中日“经济关系的发展是两国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推进广泛领域合作,支持经济界的交流很重要”。^⑥ 除了力促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外,针对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双方就维护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和自由贸易的重要性达成了共识。

二、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动因

日本政府之所以改善中日关系,是因为认识到若与具有世界第二大经济实力的中国持续处于紧张状态,日本经济的激活与安全保障的稳定将难以指望。^⑦ 加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与中日两国坚持的自由贸易意见相左,进一步促使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

首先,维护执政党联盟对华共识的需要。改善对华关系日益成为执政党的一项共识,安倍首相不得不松动对华强硬立场。事实表明,安倍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使得中日关系持续恶化,不仅日本的亚洲外交无法突破,而且也不利于日本在双边及区域经济合作的经济利益。加之,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每每经历波折后,缓和中日关系需要付出极大的政治代价,因此“谨慎处理中日关系”已经在中日各界形成了广泛共识,日本执政党联盟内部出现要求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的呼声。在2017年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201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之际,以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首的执政党“知华派”,要求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突破日本周边外交的困局。二阶俊博认为日中关系的改善,最重要的是扩大两国各界的对话和交流。随着日中两国经济关系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增强两国各领域的交流机会,对发展日中关系至关重要。

① “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jldrhd_674881/t1509735.shtml。(上网时间:2018年1月6日)

② “日中首脑会谈到底谈了些什么”,日本新闻网,2017年11月12日, <http://www.ribenxinwen.com/articles/25883>。(上网时间:2017年11月19日)

③ “日外相称希望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共同社,2018年1月26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1/1d860b4f4732.html>。(上网时间:2018年9月7日)

④ “日中在仙台举行第九轮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共同社,2017年4月19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206ecf4ed910.html>。(上网时间:2018年4月23日)

⑤ “日中近8年来重启经济高层对话”,共同社,2018年4月16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73b6fb36dec8-8.html>。(上网时间:2018年9月14日)

⑥ “日本经济相与中国商务部长确认维持多边贸易体制”,共同社,2018年4月16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4/b8ef62419b2f.html>。(上网时间:2018年4月19日)

⑦ “2018,中日会有第5个政治文件吗?”,日经中文网,2018年1月3日, <http://218.213.94.166/politicsaeconomy/politicsasociety/28620-2018-01-03-04-51-40.html?start=1>。(上网时间:2018年9月21日)

二阶俊博的主张反映了执政党内部对于安倍政府一味渲染“中国威胁论”的不同意见。加之,二阶俊博作为执政党自民党干事长,力主修改自民党章程,使得安倍能够连任三届自民党总裁,将可能成为战后以来任期最长的日本首相。当二阶俊博以执政党要人的身份阐述对华独到主张,有意承担起改善中日关系的任务时,安倍首相予以认可,因此缓和中日关系就成为日本周边外交的突破口之一。

日本执政党联盟其他政党助推中日关系改善。联合执政的公明党长期致力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公明党与自民党于 2012 年联合执政以来,每当安倍政府脱离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轨道时,公明党就以联合执政党的身份,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充分发挥修复中日关系的角色。公明党干事长井上义久曾建议称“改善日中关系的氛围在中国方面已相当热烈。希望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努力实现首脑间交流。”^①这表明公明党有意愿充分利用联合执政党的角色,力求推动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恢复中日关系。自 2017 年下半年以来,日本政府派遣各种访问团出访中国,安倍首相甚至亲率领众多阁僚出席中国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并支持日本各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对华关系上释放出很多正面信息。

其次,顺应日本经济界加强对华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日本经济界加强对华经济合作意愿强烈,安倍政府从维护本国经济利益出发,顺应了形势需要。经济合作作为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选择,对于欲摆脱长期经济低迷的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借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利好,就成为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要因。随着中国区域经济合作力度的提升,尤其是“一带一路”吸引亚洲众多国家的参与,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这让日本经济界对于安倍政府的对华强硬政策提出质疑,并呼吁政府从国家经济利益出发改善中日关系。日本经济界大多拥有着海外企业,需要日本政府在对外政策制定方面予以支持;而执政党在国会占据多数席位,在国会选举中也需要经济界的大力支持,因而两者在对外政策的制定和经济支持方面互动频繁。其中,日本

经济界代表“经团联”常设委员会和调查会,对特定的对外经济问题提出调研报告,供“经团联”提交日本政府进行外交决策,以表达“凝聚经济界的总意志、动员经济界的总智慧、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贯彻经济界的总要求”。^②原经团联会长榊原定征经常用“一辆车的两个轮子”来比喻与首相安倍晋三的关系。^③他曾表示“维持自由开放的贸易体系极其重要。为切断保护主义、反全球化的潮流,希望首相能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力。”^④这客观上使得日本政府回应财团海外贸易诉求、调整对华政策成为可能。

安倍政府顺应经济界的呼声,使得推进中日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合作成为可能。二阶俊博在 2017 年 5 月参加中国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向习近平主席递交了安倍首相的亲笔信,表达了日本支持“一带一路”构想的立场及合作意愿,希望在日中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之时,双方能举办好各种纪念活动,为日中关系发展提供推动力。^⑤2017 年底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达成的《共同倡议》指出,双方要积极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并在第三方市场推动中日企业间的合作;愿在“一带一路”倡议基础上,积极探讨两国具体合作项目。^⑥2017 年两次出席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会议的二阶俊博和井上义久呼吁发展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强调“一带一路”倡议“是有潜力的构想”。安倍首相 2018 年初听取两人的汇报时,就日本参与“一带一路”表示要作出积极“应对”。日本政府推动设立中日官民协议会,以便探讨双方扩大在亚洲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经济合

① “安倍首相晋听取联合执政党干事长访华报告”,共同社,2018 年 1 月 10 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1/c4ea86d9ac3e-12-.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 日)

② 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第 125~126 页。

③ “日本经济同友会高层批评经团联迎合政府”,共同社,2016 年 6 月 14 日,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6/122057.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3 日)

④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要求秋季临时国会批准 TPP”,共同社,2016 年 7 月 13 日, <http://china.kyodonews.jp/news/2016/07/123786.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3 日)

⑤ “习主席边读安倍亲笔信边会见二阶俊博”,日本新闻网,2017 年 5 月 16 日, <http://www.ribenxinwen.com/articles/25498>。(上网时间:2018 年 1 月 10 日)

⑥ “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七次会议在福建举行”,《人民日报》2017 年 12 月 28 日。

作的具体项目。

再次,维护自由贸易秩序的国际需要。面对美国特朗普政府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大压力,安倍政府需要缓和中日关系共同应对。以汽车行业为代表的美日间贸易逆差,一直是影响美日关系的顽疾。特朗普上台伊始就诟病日本对美贸易政策,将批评的矛头指向日本产品的大量进口,使得美日双边经贸摩擦及风险性骤然加大。特朗普还力图缔结日美双边贸易协定(FTA),并宣称“将写入极为严格的防止操纵汇率规定”。特朗普认为安倍在引导日元贬值,指责日本是汇率操纵国。而特朗普所提及的“日本汇率操纵问题”,又与支撑安倍经济学的量化宽松政策密切相关。^①美国要求日本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意在通过双边谈判使日方接受农产品等的市场开放要求,并压迫日本对牛肉等敏感农产品撤销或进一步下调关税。如果磋商破裂,美国可能启动针对日本车的高关税。^②另外,美国的钢铁进口限制政策也影响到了日本。针对美国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中国强调维持和强化以WTO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对此表示认同和欢迎。2018年8月底,日本副首相兼财务相麻生太郎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刘鹤就就反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达成一致。“双方一致认为保护主义贸易政策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好处”,应在世贸组织协定的范围内应对保护主义政策。^③

可以看出,执政党联盟率先向安倍政府建议缓和中日关系,并借助“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多次访华。接着日本经济界促使安倍政府探讨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日经贸合作,加之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对中日两国经济的不利影响,使得安倍政府改弦易辙。从对华政策调整的决策过程看,首相官邸作为日本外交的主导者,却不是缓和中日关系的最初推动者,而是执政党的自民党、公明党和经济界等决策行为体合力为之。

三、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限度

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由“一手硬”转为“一手软”,以应对国内外变局,仍是一种策略性的调整。日方能否从战略高度出发,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

认真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的积极意义来看,日本政府开始启动对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全方位的对话与交流,从而恢复了中日高层往来,有助于累积双边“互信”。在2017年11月越南岷港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期间,安倍对习近平主席表达了期望尽快举行日中韩三国首脑会谈,恢复中断多年的日中首脑互访机制的意向。随后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的东盟相关首脑会议期间,安倍首相和李克强总理进行了双边会谈,希望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0周年为契机,强力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为构建“安定的”日中关系继续作出努力。特别是,日本以中日韩首脑会议主席国身份邀请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访日,迈出了营造双边政治互信、维护东北亚共同利益的重要一步。2018年5月8日,李克强总理出席中日韩首脑会谈并正式访问日本。李总理会晤了日本天皇,出席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纪念活动暨访日招待会并发表演讲。安倍希望以与李克强总理的政府首脑会谈为契机,加强日中高层互访。从双边政治对话形式方面来讲,中日高层互动实现从多边到双边层面的提升,对于累积双边政治互信、维护共同利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调整的内容和实质看,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仍是策略性的。中日关系中所涉及到的安全利益、政治利益和价值观利益冲突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没有因为中日关系的缓和而根本解决,日本对华政策调整仍是一种局部的调整。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日本执政党内部“知华派”对华政策调整的动机具有策略性。尤其是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一直聚焦于提振中日旅游业、分享“一带一路”合作的利好,其对华理念并没有着眼于“全面”调整对华政策。尽管通过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的沟通,实现了

^① 吕耀东“特朗普执政后美日同盟发展动向及对华影响”,《当代世界》2017年第8期,第14页。

^② “日本经济界呼吁出台政策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共同社,2018年9月2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9/676a548d2c64.html.(上网时间:2018年9月22日)

^③ “麻生与中国副总理就反对贸易保护主义达成一致”,共同社,2018年8月30日,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8/d550a1be6981.html.(上网时间:2018年9月28日)

两国高层的相互往来,但日本执政党和政府改善对华政策的共识范围仍有限。二是日本经济界对华政策调整理念也局限于经济利益,希望从“一带一路”的利好中获利。尽管经济界对于安倍政府的对华决策产生影响,但并不能完全左右日本的外交决策。三是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因素对改善中日关系的作用有限。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主义使得中日产生了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秩序的需要,但日美同盟关系的客观存在以及历史事实表明,同盟体系内部的协调机制不仅仅涉及军事安全领域,而且同样可能会在经济领域达成基于共同利益的妥协和一定程度的战略共识。四是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是“两面下注”手法的新变化,以“政经分离”追逐经济利益。一直以来,安倍奉行依托日美军事同盟关系,联合所谓价值观相同国家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出于经济利益发展对华经贸合作关系。这种对华“两面下注”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导致两国间新旧矛盾叠加,两国政治互信难以形成。日本执政党内部的公明党和部分自民党“知华派”以及经济界主张缓和中日关系,助推了安倍政府对华政策的调整,但依然显现出“政经分离”的政策倾向。上述日本对华决策及政策理念表明,安倍政府对华强硬政策的改变来自于国内外政治和经济决策因素的影响,对华政策的脆弱性和不确定性显而易见。加之,中日关系改善中新旧问题依然交织存在,并且随时可能影响未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从安倍政府对华政策调整前景来看,能否持续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至关重要。中国一贯维护中日关系大局,对安倍政府能否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全面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仍存疑虑。中国外长王毅在 2018 年“两会”记者会上表示,“只要日方不犹豫、不折腾、不后退,客观对待和认同中国的发展,中方愿意与日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①王毅外长 2018 年 4 月访日与安倍首相会谈时进一步表示:“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定的各项原则,妥善处理涉及两国关系政治基础的敏感问题,把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的共识落到实处,并使之成为日本社会各界的共识”,^②表明了维护两国政治

基础,对于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性。2018 年 5 月 4 日,习近平主席应约同安倍首相通电话时指出,双方要重温和平友好条约精神,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各项原则,落实“四点原则共识”,信守承诺,按规矩办事。安倍表示,日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为契机,推动两国关系全面改善和发展。^③李克强总理于 5 月 8 日至 11 日访日期间指出“今年也是《中日联合宣言》发表 20 周年,《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发表 10 周年,这两份文件同《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共同组成中日间四个政治文件,是中日关系健康发展必须牢牢坚持的指针和遵循。”^④可以看出,中方强调两国关系的恢复和发展,需要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四点原则共识”,确实按照双方既定的原则,照章办事,有效管控彼此矛盾与分歧,维护好来之不易的两国关系。但日方只是表示高度重视两国关系的改善与发展,特别强调《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的历史契机,甚少提及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整体性和中日“四点原则共识”的建设性。显然,日方对于未来发展两国关系仍存异议。

中方需要警惕安倍政府以“协调主义”规范未来中日关系的意图。李克强总理 2018 年 5 月访日迈出了推动中日关系恢复和发展的关键一步。中方顾全中日关系大局,将推动两国关系恢复付诸实际行动,并明确强调了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是发展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但安倍就中日关系发展未来称“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希望具体推进民间企业在亚洲的基建开发。愿推动日中关系

① “外交部长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回答中外记者提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wjzbzd/t1540582.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8 月 2 日)

②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见王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s://www.fmprc.gov.cn/web/wjdt_674879/gldrhd_674881/t1551395.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5 月 1 日)

③ “习近平应约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56764.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5 月 6 日)

④ 李克强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 40 周年招待会上的演讲(全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558512.shtml>。(上网时间:2018 年 9 月 19 日)

进入新的阶段。”^①可以看出,安倍将中日关系缓和称为“从竞争进入协调时代”,表明了对华政策调整的意向和姿态。即力图通过“协调主义”使中日关系进入自己设想的“新阶段”。譬如,安倍在访华前夕对媒体表示有意“把两国关系提升到符合新时代的形式”。他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有必要确保透明度和债务的可持续性”。^②安倍在呼吁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同时,表明日本在对华“知识产权问题”上与美欧携手的立场。当然,为了应对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的中国,安倍言及“日中关系从竞争进入了协调时代”,实质是为力求与拥有巨大市场的中国对立的可能性降低到最低限度,甚至为此而避免参拜靖国神社。^③安倍政府若是为了眼前经济利益而调整对华政策,显然具有局限性和策略性。未来中日关系仍有反复的可能。可以预见,在日本政治右倾化和历史修正主义日盛的情况下,安倍对华“协调”显然不仅局限于中日“经济利益”及区域经济合作层面,将来还可能涉及“安全利益”、政治利益等一系列中日关系中存在的旧问题,甚至会涉及所谓“航行自由”等南海问题。可见,未来中日关系依然不会一帆风顺,坚持和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落实中日四点原则共识任重而道远。

结 语

安倍政府调整对华政策,是在综合国内执政党联盟、经济界建议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局势后的外交决策,仍然存在局限性。作为日本外交决策主导者,安倍秉持的对华“两面下注”政策并未放弃,只是适度调整对华强硬立场,采取“协调主义”应对中日关系。在日本谋求摆脱“战后体制”和修改和平宪法的政治右倾化背景下,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已经外溢到国际社会,中日关系业已存在的问题随时可能凸显和尖锐化,很难断言日本政府对华关系上不犹豫、不退步,因此两国关系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性。加之,安倍依然以战略性外交、价值观外交继续在国际社会渲染“中国威胁论”,并强化日美同盟的对华针对性,力求拓展美日澳印为主的“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可能引起中日关系的新摩擦。中日两国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修好

双边关系不仅有利于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事关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走向,取决于日本对华政策调的取向,国际局势对于中日关系的外部影响,以及日方是否坚持中日四个政治文件,能否累积两国政治互信。目前中日关系转圜,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安倍政府需要珍惜,继续维护两国关系发展的积极势头。○

(责任编辑:孙茹)

① “李克强呼吁日中两国携手反对保护主义”,共同社,2018年5月10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05/1e017fc96b25.html>。(上网时间:2018年5月12日)

② “安倍在访华前谈及要求中国纠正侵犯知识产权问题”,共同社,2018年10月13日, <https://china.kyodonews.net/news/2018/10/0eca0894054b.html>。(上网时间:2018年10月14日)

③ 『首相、日中首脳会談を檢討』、共同通信、<https://this.kiji.is/400913102684439649?c=39546741839462401>。(上网时间:2018年9月12日)

Abstracts

Coping with Old Issues in a New Era “ Complete Normalization ”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Fan Xiaoju

Abstract: Sino-US trade friction is upgrading. Prime Minister Abe will pay an official visit to China in October after he won the election to continue to be the LDP leader in September. Against this backdrop, how to improve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 accommodate changing situation and avoid repeated deterioration of bilateral relations is a question deserving serious discussion. It is necessary to identify strategic direction of Jap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US factor. It is needed to grasp the essence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and learn from the past experience in order to pursue sound development of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realize “complete normalization” of Sino-Japanese relations.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total normalization; strategic direction of Japan

Abe Administration's China Policy

Lu Yaodong

Abstract: Abe administration has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the light of Japanes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Bilateral party exchange, discussion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rade cooperation, and US trade protectionism prompts Abe to improve diplomatic ties with China and explore potential opportunities to cooperate. But there is uncertainty about whether Japan could adhere to four political documents signed by the two sides and implement Sino-Japanese Four-Principle Consensus.

Keywords: Sino-Japanese relations; policy toward China; Belt and Road; cooperati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and Its influence

Tian Xiaohui and Yang Yuqia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negative effect of globalization has loomed and European economy has recovered slowly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Under the pressure of refugee crisis, terrorist attack and domestic problems, French National Front has started to carry on a series of new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including anti-integration, anti-Islamization, anti-demonization and networked management since Marine Le Pen became the new leader of National Front in 2011. As a result of the transformation, the National Front emerged suddenly in 2017 French presidential election. It posed great influence on France's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rogress. But the transfor-